

化，使「青年」作為群體的社會政治功能喪失，他們的救國和革命功能不再被需要，「青年」解體，趨向對年輕人的回歸。另外，「青年」解體，年輕人對信仰的缺失和「不經意」，不是一個群體中的個別現象，也不是單純由青年開始。中國社會先有文化上的「孔家店」，作為千年文化的罪惡總代表被否定，後有政治上意識形態約束能力的衰弱，以及社會的多元化等種種因素，促成整個社會作為群體的「一致性」消解。

本書圍繞「青年」這一年齡群體，將其社會角色的形成、強化到解體的歷史沿革做出全面理清，以

獨特的社會視角構建出一部「青年」的歷史。最後作者總結道，「青年」社會角色的形成源於其功用性，也正是因其功用性的喪失而失去了主角地位。「青年」角色功能的衰退以及現代社會對家庭價值的重新認識，促使「『孩子』再度成為統合兒童、年輕人與社會的相互關係的最為重要的媒介」（頁259）。「青年」在宏大的歷史變遷中經歷的是從無到有再到解體的過程，但是，以「孝」為核心的家庭倫理在中國一直佔據着主導力量。從本質上說，年輕人作為「孩子」的角色在父母及家庭層面從未改變或受到否定。

隨着社會的開放和社會價值觀的多樣性對政治教化的中和，使「青年」作為群體的社會政治功能喪失，他們的救國和革命功能不再被需要，「青年」解體，趨向對年輕人的回歸。

清代的漢口：城市、地方精英與公共領域

● 胡悅晗



羅威廉 (William T. Rowe) 著，魯西奇、羅杜芳譯：《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 (1796-189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西方主流城市史研究認為，東方專制下的帝國城市強調的是政治和軍事職能。把儒家所謳歌的田園牧歌作為理想生活方式的城市官吏很少能夠將城市本身作為其終身居所，他們為帝國工作一定年限之後告老還鄉，從而無法形成具有城市認同和歸屬感的永久公民。少量的

羅威廉選擇近代中國本土貿易發展水平最高的一個城市——漢口作為研究對象，重點考察1796至1895年這個政府力量日趨衰退但地方經濟卻繁榮發展的時間段，考察地方精英、民眾與社區之間的複雜關聯。

市場交易無法產生能抗衡專制政體的民間組織力量。

這種觀點最大的誤區是將西方城市史的研究作為普世標準。被套入西方城市發展框架的中國城市，無論從歷史上還是邏輯上，都因推導不出「現代化」而注定先天不足。這也導致了像景德鎮那樣建立在高度專業化分工和商品貿易基礎上的城鎮，注定無法得到充分解釋。

基於對該觀點的檢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羅威廉(William T. Rowe)決心考察近代中國較少地參與到「對西方作出回應」的城市，是否形成了城市認同、民間獨立的組織力量，以及近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作者從二十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拋開上海等開埠最早的城市，選擇近代中國本土貿易發展水平最高的一個城市——漢口作為研究對象，並打破對近現代時間段的常規劃分，重點考察1796至1895年這個政府力量日趨衰退但地方經濟卻繁榮發展的時間段。該研究歷時二十餘年，出版《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區(1796-1889)》(*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和《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1895)》(*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引用只註頁碼)兩部成果。第一部描繪出漢口的商業發展和社會面貌，重點考察商業精英。第二部在保留第一部成果的基礎上，下放研究視角，把注意力從商業精英轉向普通民眾，考察地方精英、民眾與社區之間的複雜關聯。作者研究背後所關注的問題正是比較城市史研究中的核心問題，即如何看待近代中西城市不同的發展軌迹。

全書除緒論外，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從市民和城市空間兩方面着手，對城市主體進行宏觀闡釋。第二部分分析了大眾福利和公共設施與公共事業是如何逐步興起到制度化的完整過程。第三部分既分析了有利於社區融合的種種衝突活動，也揭示出不同社會群體潛在的分裂隱患。第四部分展示出國家力量與地方精英是如何在相互協調的過程中，構建了一個有效的安全防衛體系。

作者借用了公共領域(或稱公共空間)、社會衝突等理論，構建了一個精細的分析框架。為了避免「市民社會」理論內在的價值判斷及其應用於中國史研究造成的歧義和模糊，作者用了許多可以具體考察並易於呈現的社會經濟特徵變量，包括圖表和數據。作者引入新興的城市心態史研究方法，從文集、檔案、外國人在華見聞等資料中提取漢口的微觀城市生活，進而分析城市心態。該書從微觀分析入手，但關注點則聚焦於公共領域、社區、公共利益等宏觀議題。

該書使用的檔案資料多來自於西方文獻。倫敦布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檔案、循道會(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檔案等是引用頻率較高的資料。作者也多處引用報刊、清人文集、方志、族譜等文獻相互對證，加大分析可信度，並充分利用包含大量描寫社會生活的《漢口竹枝詞》，既可以考察民眾生活，又可以管窺精英對城市生活與民眾的態度。

全書行文採取問題解析式的敘述方法。緒論以1883年的叛亂引出全書問題所在，進而將問題拓展到「公共領域」和「衝突」，並按照「城市」、「社區」、「衝突」、「控制」的

分析順序奠定全書的框架。每一章都有概括本章觀點的結語。最後一章，也是筆者認為全書最精彩的一章，作者開筆引入1883年的叛亂梗概，進而層層解析叛亂者的地域來源、城市的危機反應，以及反叛亂動員的社會機制等方面，並得出全書結論。

作者認為，近代漢口的市民結構、生產組織方式、城市空間格局都顯示出「前近代」時期一個中國本土化發展水平最高的城市，具有繁榮的商業模式和傳統社會生產組織形式並行的特點。近代漢口基於對必要的公共秩序與個人經濟利益的追求，跨越了各經濟階層，形成了特定的城市認同感。漢口方言、自建城牆等進一步鞏固了這種認同。伴隨官僚政府作用的降低，地方商業精英在善堂、粥廠等大眾福利機構與防火、防洪等公共安全事業中起到愈來愈重要的作用。政府也更多採取與地方精英協調的方式實行共同管理。所有這些因素，終於得以構建出一個社區。這個社區的內部暴力事件之所以有別於歐洲早期城市，是因為地方精英與政府的緊密聯合發展出一套嚴密的城市公共治安系統。這個結論否定了韋伯關於中國近代城市沒有形成具有城市認同感的市民，以及缺乏獨立民間政治力量的觀點。

但作者又指出，導致社區認同感形成的城市聯盟是脆弱的。「精英們經常通過地方社區創辦各種組織，而這些組織實際上又是掠奪地方剩餘資源、維護主從關係的工具。」(頁418)大量移民引起城市人口急劇增加，尤其是貧困人口比例大幅擴大，導致許多行業內的管理者與勞動者相互敵視並最終分裂。

政府也愈來愈向資產者的立場傾斜。「當城市社區開始分裂成若干部分，那麼，安全力量就將變成為赤裸裸地為精英階層服務的工具。」(頁421)而頗具偶然性的是，清王朝在底層民眾與地方精英最終分裂之前就先行崩潰了。

儘管作者用嚴謹的個案分析配合厚重的理論框架挑戰了西方主流城市史觀，但該書仍有值得商榷之處。下面從史料、敘述及結論三個方面談幾點筆者的困惑。

先說史料。作者關於1883年叛亂的史料多來源於《英國駐華總領事商業報告》(*Commercial Reports by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申報》、《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等幾份材料。發生在漢口的事件，卻是由上海的報紙以及外國人的報告中反映出來，這不能不多少令人感到美中不足。作者說：「迄今為止，所有歷史研究，甚至包括縣志或府志，均從未提及這次事件」。但隨後又說，朝廷得知後「極度驚恐」，甚至用「巨患」來「指其可能導致的後果」，並極力敦促將罪犯捉拿歸案(頁382)。那麼，上至清政府，下至地方精英與政府官員，是通過何種途徑得知這一事件並高度重視的呢？這是筆者一個疑惑。

再看敘述。關於1883年的叛亂，作者通過分析《湖北節義錄》中漢陽居民與士兵死亡人數數據，先後得出「漢口地方市民曾經進行了一場英勇的抵抗」和「面對太平軍的威脅，構成漢口居民重要部分的寓居者所做出的最普遍的反應是逃走」的結論(頁305)。

那麼，我們似乎看到了在面臨一場席捲全城的暴亂時，寓居者的逃走和本地者的英勇抵抗二者形成

漢口社區的內部暴力事件有別於歐洲早期城市，是因為地方精英與政府的緊密聯合發展出一套嚴密的城市公共治安系統。這否定了韋伯關於中國近代城市沒有形成具有城市認同感的市民，以及缺乏獨立民間政治力量的觀點。

和平時期的商業貿易、城市移民等諸多因素構成了城市認同感，而在危急時刻，出於對切身利益的關注則使得城市居民作鳥獸散。然而，作者認為城市認同感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對必要公共安全秩序的需求，似乎有點矛盾。

鮮明的反差。既然漢口是一個如此不排除外，並有着相當城市認同感的地方，何以城市中來自不同地域的兩種人會有如此差異的危機應對方式？作者的解釋是「對多數人來說，即使是在王朝和地方的危急時刻，對直接利益與自身利益的關注仍然是決定行為的基本因素」（頁312）。聯繫前文，我們自然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和平時期的商業貿易、城市移民等諸多因素構成了城市認同感，而在危急時刻，出於對切身利益的關注則使得城市居民作鳥獸散。而作者恰恰在下文中得出的結論是，城市認同感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對必要公共安全秩序的需求。如此看來，似乎作者前後文中的觀點有隱約矛盾之處。

儘管作者強調導致叛亂的經濟原因並非不重要，但與歐洲早期多由經濟原因導致城市叛亂不同，「1883年密謀真正的根本動機是政治與宗教的」（頁386-87）。作者的論據是「幾乎所有參加者都有適當的穩定職業」（頁385）。由此可知，作者認為有固定職業、穩定收入的城市居民即便叛亂，動因一定不在經濟。那麼照此反推，便只有社會最底層的無產者才會因麵包揭竿而起。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中發現，罷工頻率較高的時段恰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時期，而罷工次數較多的群體恰是有着穩定職業和收入的工人群體。

筆者認為，一次小規模的叛亂或許主要是出於政治和宗教因素。但長期叛亂的反社會行動，其主導因素必定是經濟。需要注意的是經濟與政治、宗教之間複雜的視線轉移。受經濟波動之苦的叛亂者，既有可能

將怨恨轉移至當權者，從而放過那些地方經濟大戶，也有可能是在政府的鼓動下，將矛頭對準地方富戶。

最後是結論。「公共領域」方面引起的爭議最多。作者關於近代地方商業精英崛起進而塑造公共領域的觀點得到了蘭金(Mary B. Rankin)等許多學者的認同。本書中譯本的審校者馬釗指出在十八世紀後期，新崛起的商業精英將經濟權力轉化為社會權力並建立個人名望的情況，出現在多個江南城市與其他商業中心城市(馬釗：〈清代城市史：地方精英的權力基礎與社會網絡〉，載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清史譯叢》，第五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245-51)。一些武漢史學者儘管沒有套用「公共領域」的概念，但也認為城市內的自治組織已經具有近代城市基層政權的特徵。而魏斐德(Frederick E. Wakeman)等人則抱持異議，認為這一觀點缺乏足夠論證，並有用西方歷史經驗套用中國研究之嫌；黃宗智提出用價值中立的「第三領域」替代「公共領域」，描述近代中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區域(魏、黃的觀點參見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64、268-70)。楊念群指出儘管作者有明確的跳出「韋伯圈套」的意識，注重的是「事實上的公共領域」，但作者並未超越西方中心觀背後預設的目的論前提(楊念群：《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頁119-20)。

儘管爭論雙方各執一詞，但其背後共同預設則是近代中國國家與人民之間由地方精英佔主導權的「灰色地帶」。只是一方認為這就是

中國意義上的「公共領域」，而另一方認為其並不符合「公共領域」概念的特點故不能套用。撇開概念論爭，近代商業精英群體的興起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商業精英的崛起是在國家體制鬆動的縫隙中成長。少部分因與政權發生互動而演變為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大多數則囿於已經不具備商業資本主義成長所需要的良性競爭市場空間而無法真正壯大。由此而引出的問題是，近代社會轉型中的地方商業精英是更需要一個自由市場的競爭環境，還是更需要一個威權政府的體制保護？

此外，儘管作者聲稱相對於第一部而言，本書「具體分析城市勞動

階級的所思所想及其行為」(頁2)，但作者把最終落腳點放在商業精英群體上，並未能真正從作為個體的城市底層勞動民眾的角度，分析其城市認同感、歸屬感之類的問題。

綜上所述，儘管此書仍存在可商榷之處，但作者着眼中西城市比較研究的大問題，用「事實上的公共領域」避開純概念辨析的誤區，引入城市心態史、社區研究等新興領域，以細密的實證分析為「公共領域」及其在近代中國的發展演變提供了又一個重量級個案，同時將漢口與歐洲早期城市相比較，挑戰了西方主流城市史觀，是城市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

血與中國的傳統

● 張慧卿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

《許三觀賣血記》(引用只註頁碼)講述的是一個出身於農村的絲廠送繭工許三觀三十幾年的生活經歷，「血」與「賣血」是該書的主題。回鄉探親的許三觀偶然得知鄉人「賣血」的習俗後隨同前往醫院，並以賣血換取的三十五塊錢在城裏娶下了「油條西施」許玉蘭。在以後的幾十年中，每有家庭變故，許三觀就以賣血來挽救危機。直到三個兒子終於各自組建家庭後，他才恍然發覺歲月已奪去了他的健壯，「賣血救急」的「好時光」一去不返，對未來災禍的憂慮，使他在街頭痛哭起來。本文試圖從人類學親屬制度的視角出發對該書進行另類解讀。

小說中寫到，許三觀在七個不同的時期，為了七個不同的目的，

《許三觀賣血記》以「血」與「賣血」為主題。許三觀偶然得知鄉人「賣血」的習俗，在以後的幾十年中，每有家庭變故，他就以賣血來挽救危機。